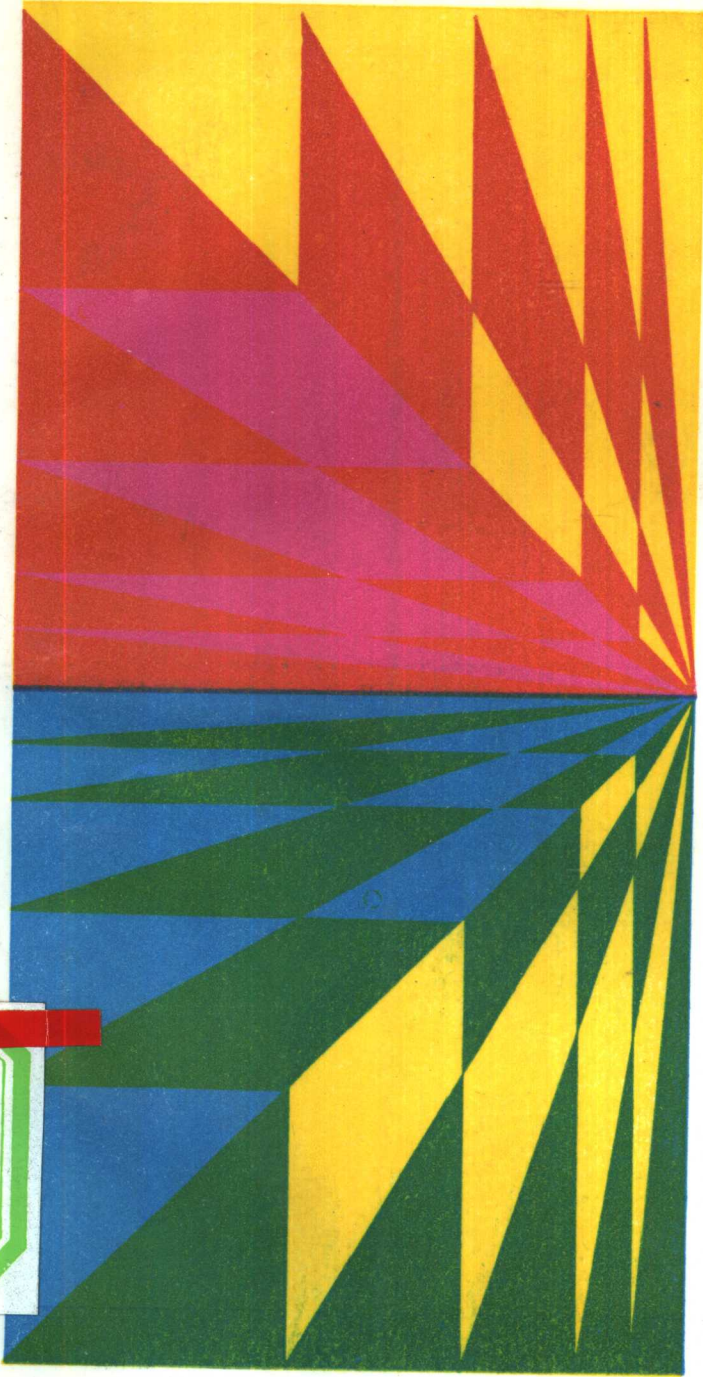




● 刘 伟 著

经济 发展 与 结构 转换

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济发展与结构转换

刘 伟 著

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

新登字(京)159 号

经济发展与结构转换

刘 伟 著

责任编辑:陈 义

*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校内)

北京印刷三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8.25 印张 210 千字

1992 年 9 月第一版 1992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2000 册

ISBN 7-301-01802-9/F·148

定价:4.95 元

内 容 简 介

本书通过中外工业化过程中产业结构转换的比较,从经济发展角度,重点考察了我国产业结构转换所面临的基本矛盾及其政策目标导向,深入研究了我国就业结构、收入分配、技术创新、地区差异和外贸战略与经济结构升级转换的关系。全书资料充实,论述清晰,新意盎然,是作者众多著述中的重要力作,颇值经济院校师生、理论研究者 and 政策制订者学习参考。



刘伟,男,1957年生。经济学博士,北京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

1978年春作为“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学生进入北大经济系;1982年获北大经济学学士学位;随即考取北大经济系硕士研究生,1984年获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87年开始在职攻读博士学位,1990年获北大经济学博士学位。先后师从陈岱荪先生、厉以宁先生、张友仁先生、刘方截先生、肖灼基先生等。1989年破格晋升为北京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

先后出版十余部学术著作并发表数十篇学术论文。主要有:《微观中观宏观社会主义经济分析》;《中国产业经济分析》(与杨云龙合著);《比较经济学》(与杨云龙合著);《比较社会主义企业制度》;《经济体制改革三论:产权论·均衡论·市场论》(与平新乔合著);《微观消费经济分析》(与朱善利合著);《利用外资项目评估》(与何小锋合著);《资源配置与体制改革》(与人合著);等。就产权问题,经济发展中的结构问题,经济体制改革等问题,先后在《经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经济学家》、《管理世界》、《经济科学》、《北大学报》等刊物上发表数十篇论文。

1985年以论文《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获全国中青年优秀论文奖;1988年以论文《论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目标导向》获全国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入选论文奖;1987年以专著《中国产业经济分析》获北大首届中青年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1990年以专著《经济改革三论:产权论·均衡论·市场论》获北大第二届中青年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1991年以专著《比较经济学》获北京市第二届社科优秀科研成果中青年优秀成果奖。参与研究的《2000年中国》(消费卷)获1985年全国科技进步一等奖;参与研究的《中国体制改革大思路》获1988年孙治方经济学奖。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节 应当怎样解释经济发展.....	(1)
第二节 作为工业化的发展与结构演变.....	(15)
第一章 中国产业结构的质态特征及国际比较	(24)
第一节 中国现阶段产业结构高度的考察及其 国际比较.....	(25)
第二节 中国现阶段产业结构效益的考察及其 国际比较.....	(44)
第三节 中国产业组织结构与市场组织结构.....	(53)
第二章 中国产业结构转轨面临的基本矛盾及 政策目标导向	(63)
第一节 经济双重转轨并行过程中的特殊矛盾.....	(63)
第二节 结构转换目标导向.....	(72)
第三节 产业政策作用目标.....	(86)
第三章 就业结构对产业结构转轨的约束	(98)
第一节 就业结构性矛盾与产业结构转换的困难.....	(99)
第二节 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流民问题.....	(106)
第四章 收入分配扭曲:资金形成困难对结构转轨的 阻碍	(123)
第一节 工业化过程中的资金(本)形成.....	(124)
第二节 收入分配扭曲下的财政疲软和反中介 机制形成对资金(本)形成的威胁.....	(145)
第五章 技术创新与结构转换	(157)

第一节	技术创新对于经济发展的意义·····	(157)
第二节	技术进步率结构与产业结构的演进·····	(166)
第三节	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	(175)
第六章	结构转换中区域同构和发展障区的克服·····	(187)
第一节	我国产业结构区域趋同倾向的经济考察·····	(187)
第二节	我国结构转换中发展障区的克服·····	(200)
第七章	结构转换与外贸、外债·····	(215)
第一节	发展中的不同外贸战略·····	(215)
第二节	改革以来我国外贸对产业结构演变的 结构性效应·····	(226)
第三节	结构转换中外贸发展的体制分析和政策 比较·····	(236)
第四节	结构转换中的外债问题·····	(245)
后 记	·····	(256)

绪 论

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经济结构质态的演变,或者说,可以把作为实现工业化过程的经济发展的核心命题,归结为产业结构高度化的进程。由此,经济发展所面临的障碍、困难以及促进发展的方式和对经济发展的价值取向,可以得到新的解释。这种解释是本书所要阐述的基本内容,当然,本书所要作出的这种解释是将中国当代经济发展的结构转化作为基本考察对象,并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考察中国当代经济发展过程中结构质态特征和结构转换的约束条件。

因而,首先必须说明的便是:能否将经济发展的关键理解为经济结构的演进?结构变化与经济发展之间有着怎样的一般、普遍的联系?

第一节 应当怎样解释 经济发展

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经济学一经产生,就包含着对经济发展命题进行讨论的内容。在以斯密、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以及在此之前的经济思想中,经济发展的命题被包含在财富增进这一

命题之中,笼统地加以解释。古典经济学家们为从经济理论上证明尚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的地位,极力将资本与社会财富的增进联系起来,因而,什么是商品价值、价值的源泉是什么、为什么等价交易才是公正的这些问题,成为那一时代经济学关注的热点。由此,那些因素导致财富增长便成为经济理论关注的重要命题,因而,资本积累问题、劳动生产率问题、社会分工问题、国际贸易问题等一系列成为后来发展经济学研究的基本问题被涉及。然而,古典经济学并未系统地考察具有独特意义的经济发展。此后直到本世纪 40 年代之前,经济发展问题几乎从西方正统经济学者视野中消失了。因为时代的演进,资产者已不再要求传统社会承认其公正性,它认为自己、而且社会也承认它本身就是公正,在经济理论上,自边际革命发生之后,西方经济学者致力于寻找经济均衡的位置,即把对价值问题的关注转移到价格确定上来,把对交易的公正性的兴趣转移到交易条件——价格的确定上来。自此直到第 2 次世界大战之前,正统的西方经济理论对发展问题并未予以重视。这与西方发达国家已完成工业化——当代发展中国家正在实践的历史——有关。直到本世纪 40 年代以前,西方学者还很少使用“经济发展”一词。^①

战后,许多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一批新独立的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面临一系列经济发展的课题和矛盾,这些课题和矛盾吸引了一批西方经济学家的注意,从而便有了较系统、较严格意义上的西方发展经济学。当然,即使在西方学者中间,对经济发展命题的解释也是极不相同的。

经济发展的实质到底是什么?对于这一问题可以从不同立场、不同角度去认识。概括而言,西方学者对经济发展的实质大致有这

^① H. W. 阿恩特,《经济发展语义史》,载《经济发展和文化变革》,1981 年 4 月号。

样几种解释：经济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是发展中国家实现市场化的制度演进过程；经济发展是发展中国家计划化的过程；经济发展是工业化的过程；经济发展是社会革命，尤其是阶级斗争的过程。等等。^①

究竟应如何理解经济发展的实质？

首先，我们认为，作为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绝不是单纯的经济增长。当然，没有经济增长的经济发展是不可能发生的，但只有经济增长而没有其他根本变化的过程虽然容易发生，却是没有意义，因而是不能看作经济发展的。这里的根本变化主要指经济结构、经济类型和经济体制的持续的进步性变革。如果不发生这些方面的根本变化，只有传统经济在原有结构、类型、体制基础上的单纯数量增长，那么，这显然只是传统经济的简单复制和放大。这个复制和放大的过程及其结果，决不可能改变落后国家传统经济中的历史特征。这里所说的历史特征可以从很多方面去概括，但就经济本身简单地来说，没有效率是最突出的特征。这种效率从最概括的意义上是指资源配置效率。传统经济如果只有增长而没有结构、类型、体制的变化，那么，这种增长就只能依赖于单纯增加资源消耗（主要是自然资源消耗）去实现。仅在这一点上，经济发展也与此有着根本区别：“发展主要在于通过现存资源的不同使用方式从事新事业，而不考虑那些资源是否增长”^②。

其次，在特定的历史区间里，我们可以将内含着经济结构、经济类型、经济体制根本变化的经济发展过程归结为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

显而易见，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经历了以工业化为主体的

① 参阅刘伟、杨云龙《比较经济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第10—14页。

② A. 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牛津大学出版社，纽约，1961年版，第68页。

经济发展过程,因而它们之所以发达的全部成就就归结为工业发达的成就;几乎所有的不发达国家都承受着传统农业经济占绝大比重、现代工业规模过小的历史拖累和压力,因而它们之所以不发达的经济根源也都被归之于现代工业的不发达。正是从这种世界范围里既定历史现象的归纳中,一些现代西方经济学家们就提出了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结构”的命题^①,并从发达国家自身实现工业化进程积累起来的历史经验出发,主张用现代工业的发展来改变不发达国家经济落后的历史面貌。应该说,发展经济学作为现代经济科学的一门独立分支科学,从形成之日到今天,研究经济落后国家或农业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始终是其主要内容 and 基本任务。

但是,从规范分析的角度来看,从现象的归纳中得出的只是经验性的认识,不能等同于理论上的思考。所以,上述思维方式被后来的激进派发展经济学家讥称为“既成事实,因此正确”。尤其是自本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加速发展工业化的过程中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失误,产生和积累了许多新的矛盾和困难。于是,走工业发展道路以改变经济落后现状的理论和实践更受到多种非议,甚至被贬称为“唯工业化主义”。

这里暂且不论及激进派发展经济学家的主要倾向不是反对一般的工业化,而是认为发展中国家应该摆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控制,独立自主地发展民族经济。这里也先不区分工业化进程本身同各国发展工业化的具体方式的区别,不讨论这些国家工业化发展中出现的失误、矛盾和困难的不同因果联系。这里需要从根本的理论层次上进行论证的是,我们将经济发展过程归结为工业化进程的基本命题,并不是以“既成事实”的经验性归纳作依据的,而是

^① “二元结构”是由 J. Boeke 在 1910 年最先提出的。见《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86 年第 3 期,第 49 页。

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在特定历史区间里的深刻把握。将这种把握归结起来,不发达国家之所以只有通过推进工业化进程来改变不发达面貌,乃是因为工业化提供了一种社会经济发展摆脱内在限制而不断加速度前进的能动力量,并且改造和扩展了社会经济运行过程的内部框架,为人本身的进步和自由充分发展创造了新的历史空间和现实可能性。简而言之,只有工业化才将科学变成了生产力,并且在全社会的规模上将经济运行过程确立在直接生产过程和资金运行过程的统一之上。从而使人们之间的普遍依赖与全面联系发展起来,创造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新形式。

先谈将经济发展过程归结为工业化进程的第一个理论支点,即只有工业化才将科学变成了生产力,提供了一种社会经济发展挣脱内在限制而得以不断加速度前进的能动力量。

第一,大机器生产的形成、发展,不仅逐渐用科学原理驾驭的自然力、机械力、化学力等等代替了人的肌肉力和畜力,而且逐渐将人们世代代口传心授积累起来的劳动经验和技巧从生产者身上分解出来,物化为更加系统、更加严密准确、更加专门化发展的机器体系和规范化的生产技术,从而突破了生产力的发展要受到作为生产力要素的劳动者的人身器官的自然限制。使生产力由经验的、手艺的、技巧的生产力改造成为科学的生产力。正如马克思所说:“生产上的智力在一个方面扩大了它的规模。正是因为它在许多方面消失了……这个分离过程在简单协作中开始,在工场手工业中得到发展。在大工业中完成。……大工业则把科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能力与劳动分离开来。并迫使它为资本服务”^①。

第二,大工业生产将生产过程的经营管理由过去“形形色色的天然首长”的固有特权变成了生产过程内在的,从属于科学规律和技术规律的特殊职能。管理的性质也由此从过去的任意性、经验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00页。

性、粗略性变成了科学的规划性、系统性、精确性。管理才从此作为关键的生产力因素并入生产过程。即使在农业领域里,大工业也使得“最陈旧和最不合理的经营,被科学的工艺上的自觉应用代替了”^①。

第三,大工业使劳动力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形成了劳动变换的“不可克服的自然规律”。因为大工业的特殊生产方式和手段,使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不断地使整个社会生产结构发生变动,从而不断地把大量资金和大批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转换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因此,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②。这样,大工业就一方面摧毁了过去将各种劳动职能分割为世袭职业,固定为种姓,甚至硬化为行会的僵死陈旧的种种束缚;另一方面又使得劳动者不断接受多方面教育和训练成了“生死攸关的问题”。这就从经济发展的内在构成上使教育成为了生产力,作为对科学技术知识的普及传播的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就“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③。

第四,大工业不仅使生产过程中应用的科学成了生产力,而且也使生产这种可资应用的科学成果的科学研究活动、发明创造活动成为了专门的职业并进入整个社会生产力的系统^④。由此,便形成了一个需要科学,也产生了科学的新时代。

由此可见,工业化的发展不仅使社会物质生产获得了新的动力量,而且同时也以不可克服的趋势(给以“生死攸关”的强制),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1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33—535页。

③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30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16—217页。

造成了生产者新的素质、关系、才能、观念，甚至语言的根本变化和连续不断的普遍的丰富发展。这又恰恰顺应和实现了人类不断趋向进步的内在逻辑。

虽然当代发展经济学中的激进派(或又称新左派)是从马克思的著作中寻找武器,因而又被称之为发展经济学中的马克思主义派^①。但他们却并不理解马克思那种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深刻把握,尽管他们强调经济发展中的和谐、平等、民族独立、消除剥削、公平分配等等一般说来是对的,但他们将工业化进程的形式唯一地归结为资本主义形式,并笼而统之地将推进国家工业化贬为“唯工业主义”却是错误的。他们恰恰理解不了将社会经济发展过程归结为工业化进程的历史含义和内在根据正是源于马克思的深刻思想。显而易见,特定历史环境造成了他们视觉上的盲点:一方面,当代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和不少发展中国家(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的失误及其一系列新的问题,使他们看不到发展中国家承受的“苦难”不仅是由于工业发展(准确地说,应是具体的工业发展方式)带来的,而且更多、更深刻地是由于工业不发展所积聚的。另一方面,他们(或其中一部分人)不是生活在发展中国家里,对于工业及其工业文明不发达条件下的贫困、落后、愚昧的现实背景和对人们思想上的种种僵化压抑气氛缺乏感同身受的理解。因此,他们不知道这些方面的深刻变化只有通过工业化进程将科学真正地变成生产力,既改造社会生活的物质世界,又改造社会生活的精神世界才可能发生。

将社会经济发展过程归结为工业化进程的另一个基点,还在于工业化改造和扩展了整个社会经济过程的内部框架。即一方面用大机器生产的高度专业化、社会化生产体系和不断创新的科学技术,改造了过去的狭窄而自成体系、自我封闭的实物生产过程,

^① 见金德尔伯格等:《经济发展》,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210—222页。

另一方面又将改造了的直接生产过程同整个社会的资金运动或收入——支出过程联结了起来。随着生产技术本身的专业分工和生产者劳动职能的高度分化,每个生产单位的产出不能再直接完全地满足本单位下一次生产所需要的投入;每一个生产当事人的消费也不能再直接从本单位的产出品类里得到满足;随着生产力发展内在限制的消除,社会生产又获得了加速度的扩张能力,因而每一生产单位的产出数量便远远超出了本单位以及相邻区域里的消费需求。这一切就从根本上破除了传统的自然经济中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之间的直接衔接方式,而将商品经济的流通过程(资金运动过程)嵌入其间。这样,每一个生产单位的投入和产出之间的转换,就只有在专门的市场体系中才能实现;每一个生产当事人从自己劳动结果里得到的收入和他用以满足自己的各种生活消费的物品,也同样需要有一个通过市场而实现的种类变换过程。社会经济运行过程由此扩展了,各生产单位之间、各生产当事人之间的社会联系也由此扩大了,丰富了。正因为如此,所以首先感觉到这种社会经济运行过程变化的魁奈所写成的《经济表》,在长时期里(工业化进程的早期阶段)不被人理解,而只有马克思才准确地指出了《经济表》的理论价值,就在于“用几根粗线条表明,国民生产的具有一定价值的年产品怎样通过流通进行分配,才能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使它的简单再生产即原有规模的再生产进行下去”^①。

只有社会经济运行过程本身扩展了,才会使生产单位和生产当事人之间的普遍依赖和全面联系发展起来。也只有当这些关系通过全面而充分地发展得到成熟之后,整个社会才可能提高调控自身活动的主观能动性和科学性,才可能不断地提高人们的才能和素质,促进人类的不断进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同意赫伯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398页。

脱·马尔库塞的见解：“现代社会看来有能力控制社会的变化，即能够建立完全不同的体制，导致生产过程的新趋向，创造人类生存的新方式的那种质的变化。这种对社会变化的控制也许是先进工业社会的最卓越的成就”^①。而在传统的小生产者的经济体系中，小生产者“进行生产的地盘，即小块土地，不允许在耕作中进行任何分工，应用任何科学，因而也就没有任何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任何不同的才能，没有任何丰富的社会关系”^②。

由此可见，工业化进程中发生的深刻变化，不仅连续不断地、根本地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物质生活面貌，而且也连续不断地、根本地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精神生活面貌；不仅使人类外在的物质世界变得更为丰富，而且也使其内心的精神世界变得更为丰富——这种丰富不仅使过去的人们只有在神话幻想里才敢企望，甚至做梦都不敢想象的物质享受成为现实，成为最普通的日常消费资料；而且也使过去素被尊崇的神圣的信条、观念和见解变成了陈旧的、愚昧的东西，过去被口诛笔伐甚至惩之以火与剑的“异端邪说”，则变成了人们普遍接受的科学常识。因此，便历史地形成了人类同自然的关系（以及人类同自身的关系）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飞跃进化的转折点。正是基于此种认识，我们认为，工业化进程中发生的深刻变化是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整个社会进步的根本目标相吻合的，是这些根本目标的具体实现方式。

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就从人类文明进化的历史高度上，将特定历史区间里的经济发展过程归结为工业化进程，从而将这个区间里的社会经济史归结为传统农业同现代工商业的矛盾运动史。马克思指出：“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的基础，都是城

① 埃冈·纽伯格，威廉·达菲等：《比较经济体制》，商务印书馆 1985 年版，第 15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693 页。

乡的分离。可以说,社会的全部经济史,都概括为这种对立的运动”^①。众所周知,在马克思的著作里,城市是作为现代工商业发育、形成、发展的基地和象征,而农村则是传统农业的聚集空间。指明这一点,就省去了一切解释的工作。

显然,这里把经济发展归结为工业化的实现,但并不是将其简单地归诸于工业化,而是对工业化本身作出特别的历史解释,尤其是将其解释为社会经济结构质态的历史进步,而不是视为单纯的工业增长,在此基础上,把经济发展的实质归结为工业化的历史实现。

正因为如此,社会经济体制及其变化便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约束条件,发展既然是经济结构——现代工业改造传统经济的过程,它只能是历史的变化,而制度演变正是经济发展社会历史性的集中体现。甚至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经济发展本身就具有体制演变含义。正是基于这一点,一些西方学者把发展解释为体制改革的历史,特别是把当代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解释为实现市场化的过程。事实上,我国现阶段强调发展与改革的统一,也是基于改革必须适应发展要求,发展需要体制变化这一基本历史逻辑。困难的是如何切实寻找到发展与改革的内在联系。当然,当代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困难绝不仅于此。

既然经济发展是一个比单纯的经济增长复杂深刻得多的工业化进程,既然这个工业化的历史进程包含着经济结构、发展类型和经济体制以及经济文化的深刻进步,因而,其中面临的困难和矛盾也就是多方面的、深沉的。

首先,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不仅现实地规定着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而且成为发展中国家难以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原因,贫困本身具有累积效应,即所谓贫困再生着贫困,从而使发展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90页。